

“驯化恐惧”：《奥瑞斯忒亚》中复仇女神的斯芬克斯因子形态

“Domestication of Fear”: The Sphinx Factor Form of the Erinyes in the *Oresteia*

任 晓 (Ren Xiao)

内容摘要：在古希腊，女性怪物是有序文明之外的产物，暗示着城邦公民对其所代表的潜在威胁与破坏的恐惧心理。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三联剧呈现的正是复仇女神所代表的恐惧及其转变的过程。在兽性因子的操控下，她们以混合的动物性躯壳和非理性的癫狂宣称报复性伦理，并在更广泛的程度上以全体女性的声音说话。直到复仇女神以清晰的语言进入与阿波罗论辩的公共空间中，在对话伦理的作用下，她们所蕴含的非理性的自然力量被改造成公民熟悉的形式，进而在雅典娜的影响下逐渐剥离自身的兽性因子，重新选择了伦理身份，即立足于家庭生活和公共仪式之中审慎安静的女性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复仇女神的伦理转变反映了古典时期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规范对女性的限定和控制，并指向埃斯库罗斯面向全体公民的伦理教化。

关键词：《奥瑞斯忒亚》；复仇女神；斯芬克斯因子；伦理

作者简介：任晓，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悲剧伦理与科技伦理。

Title: “Domestication of Fear”: The Sphinx Factor Form of the Erinyes in the *Oresteia*

Abstract: In ancient Greece, female monsters were considered manifestations beyond the bounds of civilized order, symbolizing the citizens' fear of the latent threats and potential for the destruction they represented. Aeschylus's *Oresteia* trilogy illustrates this fear embodied by the Erinyes and their subsequent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nimal factor, the Erinyes advocate the ethic of vengeance through their hybrid animal forms and irrational frenzy, broadly representing the voice of all women. Until the Erinyes entered the public space of debate with Apollo in clear language, the irrational natural forces they embodied were transformed into forms familiar to citizen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dialogic ethics. Under Athena's influence, these forces gradually shed the animal factor and redefined their ethical identity as cautious and composed female members grounded

in domestic life and public rituals. Importantly, the Erinyes' ethic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e classical period's male-dominated ethical norms that sought to define and control women, pointing to Aeschylus's didactic efforts aimed at the entire citizenry.

Keywords: the *Oresteia*; the erinyes; sphinx factor; ethics

Author: Ren Xiao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2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thics in ancient Greek tragedy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Email: 740797760@qq.com).

在古希腊神话中，怪物形象构成了其叙事结构的核心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像米诺陶(Minotaur)、美杜莎(Medusa)、赛壬(Sirens)和斯芬克斯(Sphinx)等怪物往往代表着人类心理、自然力量或伦理观念的象征化与具体化。其中，怪物及其蕴含的“恐惧”显示了“混乱战胜秩序”“非理性压倒理性”“自然侵蚀人类文明”的潜在可能性(Felton 103)。因为怪物彰显着古希腊文化中所恐惧事物的内容，并与“希腊人理想化中的有序和理性的社会相反”(Felton 104)。它既不是人类或动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从而形成“令人不安的混合体”，一种被称为“本体论阈限”(ontological liminality)的形态(Cohen 6)。而在这些怪物中，女性占据了大多数的数量。正如简·布雷默(Jan Bremmer)所说的，荒野是怪物等“无序”事物的所属之地。¹由于希腊人经常将女性视为“自然的野性(希腊人将其定义为超越有序文明边界的事物)”。因此，希腊神话中很大一部分的怪物是女性。²她们可能有相似的面孔、武器、符号、特权或技能，拥有生育和死亡的能力，并与血统、不朽和命运等因素相关联。³女性掌控生死的能力指向了她们本身具备的危险性，因此被当作异类并被主流叙事推向边缘。“这些叙事将正常、现实和理性的世界等同于希腊和男性，将野蛮、不真实和世界的边缘等同于女性”(Marciniak 199)。古希腊人之所以将女性怪物视为城邦生活中独特的存在，其目的在于通过重复的叙述而对她们背后体现的恐惧进行命名，从而以期驯化或剥夺女性代表着的具有威胁的事物。⁴也就是说，“当女性表达无法控制、愤怒或充满愤怒的情绪时”，便

1 参见 Jan N. Bremmer, “Monsters en fabeldieren in de Griekse cultuur,” *Mededelingenblad.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Allard Pierson Museum* 68 (1997): 3.

2 参见 Debbie Felton, “Rejecting and Embracing the Monstrou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dited by Asa Simon Mittman and Peter J. Dendle, London: Routledge, 2012, 105.

3 参见 Martina Treu, “Dark Ladies, Bad Girls, Demon Queens: Female Power and Seduction from Greek Tragedy to Pop Culture,” *Seduction and Power: Antiquity in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edited by Silke Knippschild and Marta Garcia Morcillo, London: Bloomsbury, 2013, 73.

4 参见 J. J. Cohen, *Monster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6, viii.

被赋予了某种怪物的特质，从而使人类产生恐惧。进一步地，人们将这种女性的特质视为“兽性”，并反过来将其“拟人化”。“在没有男性文化的情况下，女性代表某种兽性、野蛮和原始的东西”，女性的愤怒与动物母亲的情感类似，“她的行为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支配和控制”（Gabriel 56-57）。在一众古希腊的女性怪物中，复仇女神（Erinyes）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她们可能与生与死（作为复仇者、惩罚者或连环杀手）等古老力量相关，也可能化身为美丽危险的女性，富有诱惑性。¹ 埃斯库罗斯作为延续神话写作模式的悲剧诗人，在《奥瑞斯忒亚》（*the Oresteia*）² 三联剧³ 中呈现了复仇女神由怪物到城邦成员的转变，一种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两部分构成的斯芬克斯⁴ 因子（Sphinx Factor）式的伦理选择。⁵

总体来说，本研究以古希腊古典时期的城邦生活为背景，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对《奥瑞斯忒亚》中复仇女神的“做兽”还是“做人”的伦理困境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从而探索她们伦理身份的转变过程及其背后反映的公元前5世纪新的城邦性别伦理规范。进一步地，通过本研究以期对女性怪物的驯化与城邦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度的挖掘，在剖析性别身份形成过程的多重权力动态中，对当下社会的女性困境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混合的身体形态：理性秩序的威胁性力量

怪物的主要特征是“尺寸异常”、“与任何人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和“引起厌恶”（Felton 104）。从这个层面上看，复仇女神正是一种刻板的怪物形式，尽管她们被描述为“女性”，但更多体现的是“兽”的形态和品质。她们呈现的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一部分”，这些“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兽性部分”。进一步地，“兽

1 参见 Martina Treu, “Dark Ladies, Bad Girls, Demon Queens: Female Power and Seduction from Greek Tragedy to Pop Culture,” *Seduction and Power: Antiquity in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edited by Silke Knippschild and Marta Garcia Morcillo, London: Bloomsbury, 2013, 77.

2 本文引用西方古典文献的译文，均系笔者依据古希腊原文，并参考不同英译本、中译本译出。文中的引用标注西方古典学通行编码，埃斯库罗斯剧作行码随文标注。埃斯库罗斯剧作的古希腊原文参见 Aeschylus, *Oresteia: Agamemnon, Libation-Bearers, Eumenides*, translated by Alan. H Sommerstein, MA: Harvard, 2008。由于《奥瑞斯忒亚》是由三联剧的形式构成，本文在引用时采用简写的形式，即《阿伽门农》简写为“Aga.”，《奠酒人》简写为“Cho.（由希腊文“Choephoroi”而来，是其常见简写形式）”，《和善女神》简写为“Eum.”。

3 指《阿伽门农》（*Agamemnon*）、《奠酒人》（*Libation-Bearers*）、《和善女神》（*Eumenides*）。

4 从性别层面看，斯芬克斯是一个长着女人的头、狮子的身体、鹰的翅膀和蛇一样的尾巴的女性，显示了怪物与女性的关系。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性因子只是人在进化为人之后身上的动物性残留，它不仅说明人从兽进化而来，而且说明人即使脱离野蛮状态之后变成了文明人，身上也还存在有动物的特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9）。因此，复仇女神的“兽化”类似于古代对美杜莎以及蛇发女妖的描绘，在城邦话语的叙述中往往作为秩序与文明的反面存在，由此凸显了她们及其代表的女性特有的动物性和非理性，并进一步地将这些女性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

当复仇女神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时，就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和震惊，甚至造成了观众的流产。¹在《奠酒人》结尾中，尽管她们暂时并未获得实体形象，仅仅作为投射在奥瑞特斯头脑中的幻象存在。直到《和善女神》，阿波罗的女祭司皮提亚（Pythia）为观众展示了更为可怖的复仇女神形象：

在他近旁的位置上，一群惊异于常人的女人正酣然大睡。不！我应该称她们为蛇发女妖，而不是女人；但我也无法将她们与蛇发女妖的相比较。曾经有一次，我在一幅画中看到一种怪物夺走了菲纽斯（Phineus）的食物。这些怪物没有翅膀，全身呈黑色，令人憎恶。她们打着令人厌恶的鼾，眼睛里滴着令人作呕的泪水；她们那身装束不适合带到神明的雕像前或进入人类的家中。（Eum. 46-55）

这是复仇女神沉睡时的形象，当她们梦中醒来时便恢复了复仇的使命，即通过强有力的诅咒来延续以牙还牙的报复性伦理，以此持续地加深观众的恐惧情绪。复仇女神的第一个连贯的话语由单个单词“抓住他”（λαβέ）（Eum. 130）的四次重复组成，这意味着她们情感的狂乱并可能伴有狩猎的嚎叫。这些野性的声音可能也有助于加深性别之间的对比，从而强调男性的优越性。在“第一合唱歌中，复仇女神使用了“诅咒歌曲”（Binding Song），这是一种仪式歌曲，每个单词都被赋予了具有魔法的属性。²这些诅咒之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造成观众的恐慌，因为诅咒以补充的方式附着在一个家族的连续几代人身上，类似于“遗传的罪恶感”。³这样的癫狂的诅咒，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引发观众的情感恐慌，并一次次地使人们产生持续性地失序感和威胁感。

此外，复仇女神也作为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母亲权力”⁴的代表者，与

1 参见 Helene Foley, “Choral Identity in Greek Tragedy,” *Classical Philology* 1 (2003): 7.

2 参见 Cynthia Werner, *The Erinyes in Aeschylus' Oresteia*, 2012,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PhD dissertation, 120-121+125.

3 诅咒是古希腊戏剧中经常出现的表演形式，关于其四种定义参见 N. J. Sewall-Rutter, *Guilt by Descent Moral Inheritanc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Greek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9.

4 《和善女神》中提到，埃里倪斯的母亲是“黑夜女神（Νύξ）”（321），这充分体现了与母亲角色的关系和本身单性生殖的特质，从而与三联剧中更广泛的性别冲突主题产生联系。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共生关系。因为克吕泰涅斯特拉声称谋杀行为本身的实施者为复仇女神对阿特柔斯的报复（Aga. 1500-1552）。¹与此同时，克吕泰涅斯特拉拥有与复仇女神类似的动物性的形态和野性。在卡珊德拉的预言中，克吕泰涅斯特拉是“双足母狮（δίπους λέαινα）”，阿伽门农是“高贵的狮子”（Aga. 1258）。“母狮”赋予了克吕泰涅斯特拉积极的角色和威胁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集中彰显了男人和女人、家庭和战场、私人和公共空间、人类和野兽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²“双足母狮”一方面指向克吕泰涅斯特拉个人权威的集中展示，另一方面是她与狮子完成猎杀后相似的视觉呈现。同时，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弑夫行为本质上是“非理性意志”的作用，“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意志。它的产生并非源于本能，而是来自错误的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非理性意志是理性意志的反向意志，是一种非道德力量，渗透在人的伦理意识中”（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13）。克吕泰涅斯特拉的犯罪欲望是“对阿伽门农本人和他作为一个男人地位的嫉妒”（Winnington-Ingram 132），她通过强烈个人主张实现自我存在，拒绝社会提供的角色定位，展现了一种以毁灭男性为代价的极端女权政治。从这个层面上看，复仇女神既作为“兽性因子”的形态和功能的呈现者，也在更广的范围上作为女性整体上的斯芬克斯因子和“非理性意志”而存在。作为复仇和诅咒的女神，她们与海伦和克吕泰涅斯特拉表现出对男性秩序产生威胁的潜力，特洛伊因海伦的越轨而被毁灭，阿尔戈斯因克吕泰涅斯特拉统治而陷入恐惧中，“这表明复仇女神（及其潜在的有益能力）必须处于男性之下控制”（Werner 11），而这主要通过她们新的伦理选择而实现。

二、流动的身份边界：祛除兽性的伦理选择

在古希腊政治生活中，对立、派系斗争、叛乱和内战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城邦制度的特殊性——即强烈自豪感的自治和开放性的边界。因而，在城邦生活中时刻充斥着富人与穷人、本邦与外邦、男性与女性之间争夺政治权、公民权与参与权等不同类型的斗争。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论辩成为解决模糊不清的问题和消除潜在威胁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复仇女神从原始的荒野进入城邦生活的第一步。她们以对女性权利的清晰陈述而出现，认为儿子杀害母亲比妻子杀害丈夫更重要，因为婚姻关系只是规

1 参见 Emmanuela Bakola, “Seeing the Invisible: Interior Spaces and Uncanny Erinyes in Aeschylus’ Oresteia,” *Gaze, Vision, and Visuality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edited by Alexandros Kampakoglou and Anna Novokhatko, Berlin: De Gruyter, 2018, 181.

2 关于双足母狮的问题参见 Ariadne Konstantinou, “The Lioness Imagery in Greek Tragedy,” *The Quaderni Urbinati di Cultura Classica* 2 (2012): 127-130.

3 参见 Peter T. Manicas, “War, Stasis, and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 (1982): 680.

定性社会关系的一种，而母子关系根植于共同的“血缘”。针对复仇女神的观点，阿波罗的反驳指向赫拉与宙斯的“婚姻誓言、库普里斯所赋予的甜蜜情爱以及正义之神保护下的男女结合”（Eum. 210-218）。在这里，埃斯库罗斯通过设置双重视角，使二者分别坚持个人的观点和伦理身份，因为“叙事能够给个体经验赋予一定的结构与秩序，具有建构世界的能力。在被叙事建构起来的世界中，叙述者和人物认同了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投射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对自我产生一定的意义”（尚必武 27）。因此，当复仇女神与阿波罗在争论奥瑞斯忒斯因弑母而犯罪还是因维护父亲权力而无罪的问题时，显示了二者因身份认同问题而产生的不同的伦理标准。从这里来看，“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价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换句话说，“伦理选择的复杂性和责任性正在于人类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非公约性，因为做出选择所包含的道德份量不仅在于做出什么选择，还包括怎样做出选择”（杨革新 120）。而对于人类本身而言，“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在动物身份和人类身份之间做出选择”（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4）。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复仇女神必须选择坚持还是抛弃自身的受控于自然意志的伦理标准。促成这一切的转变则取决于复仇女神的认知功能，认知过程中的关键在于她们是否“能够不断地用人性因子抑制和引导兽性因子，始终让人性因子处于主导地位，不断地通过伦理选择学习做人”（聂珍钊，“论人的认知与意识”94）。因此，促成复仇女神身份转变的节点变得异常重要，而雅典娜的出现为她们的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契机。

雅典娜在出场时便表明了她的伦理身份，即一个“完全属于父亲”（Eum. 738）的雌雄同体的人。雅典娜之所以如此宣称是因为她诞生于宙斯的头颅，这也正是她理性精神的起源，也就为她进行伦理选择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理性思维的影响下，雅典娜决定投票支持奥瑞斯忒斯，宣告其无罪，并创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战神山法庭。一开始，复仇女神并未立刻遵从该判决的结果，她们内心秉承的仍然是自然意志、原始惯例和女性权利结合的主张，从而迸发出极大的报复性激情，诅咒雅典“从此枝叶不生结果，正义的报复，蔓延于这片大地”（Eum. 785-786）。直到通过雅典娜的劝解，在情感安抚、权威震慑和宗教权利三重力量的作用下，复仇女神接受了男性制度之下以理性解决冲突的方案，从而转向对城邦的祝福。自此，复仇女神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即从惩戒家族罪犯的埃里倪斯转而由雅典娜安抚，成为“崇敬女神”（Revered Goddesses）¹，永恒居住于雅典城邦。“当兽性因子得到抑制和约束时，人就会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人如何用人性因子约束

1 关于复仇女神的名字问题参见 Edith Hall, *Greek Tragedy: Suffering under the Su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4.

兽性因子，选择做人而不是做兽。因此，做人是伦理选择的道德目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类文明三阶段论” 8）。也就是说，在此时，复仇女神的兽性因子得到了约束，而这种人性因子正是来自于男性，她们整个的转变过程呈现的正是男性理性对女性野性的驯化，以此明确规定女性活动的“正确”领域——即排斥于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忠实的妻子、孩子合法的母亲和受人尊敬的城邦仪式的参与者。¹

三、教化的功用：古典时期性别伦理范式的构建

复仇女神的身份选择蕴含了一定的伦理智慧，她们“对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予以遵守，对旧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束缚勇于突破，并倡导和践行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的伦理道德”（苏晖 103）。这种新的道德指向的正是公元前 5 世纪的奥林匹斯诸神的地位高于复仇女神为代表的原始神，希腊人高于野蛮人，男性高于女性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文学是道德的产物，也成为特定历史情况下的一种伦理表达形式。² 因此，在《和善女神》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剧作中“完成了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在第一部中大言不惭地宣称的政治权力（沿着母权制神话的路线）向女性仪式权力的转移”（Zeitlin 173），最终使女性成为附属于男性的妻子和女儿。进一步地，由丈夫赋予妻子的理性与知识，本质上是属于男性的特质。“理想的、顺从的、听话的妻子可以说与她的丈夫在智力上是匹配的”（Gabriel 12）。从男性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女性在生物学上生来就不如男性。她们的低调，受剥削和限制的女性角色被自然世界牢牢地固定下来”。在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自然而然地处于被征服的地位”（Gabriel 15）。这种观点在埃斯库罗斯所在的古典时期尤为显著。在这个时期，希腊公民资格特别排除了两个主要群体：女性和外邦人（包括奴隶）。当然，女性并未完全排斥在一切政治进程之外，因为在官方的宗教活动中，她们仍保持自身的参与。例如，雅典的首席祭司是一位女性³，这也与三联剧中复仇女神保留的宗教职能建立了关联。

“由于伦理规范不能先天遗传而只能后天学习，因此如何做人就成为后天的伦理选择，道德教诲就成为伦理选择的方法。道德教诲的价值在于教导人（teaching and learning）怎样抑制身上的兽性因子而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类文明三阶段论” 8-9）。为了建立

1 参见 Edith Hall, *Greek Tragedy: Suffering under the Su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7.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3 参见 Paul Cartledge, “Democratic Politics Ancient and Modern: From Cleisthenes to Mary Robinson,” *Hermathena* 166 (1999): 9.

和巩固上面表述的城邦生活中的性别规范，埃斯库罗斯发挥了诗人的“教化”（*paideia*）功能¹，通过一年一度的城邦酒神节表演，使公民获得作为希腊人、男性、公民和雅典人的身份认同和权利归属。²在这个过程中，“故事讲述凭借其本质特征变成了一项道德参与活动，敦促我们做出同意与否的判断。他要求我们参与其中并对其做出反应或按照罗森布拉特的观点‘与之沟通交易’（*transact*）”（杨革新 119）。因此，复仇女神的转变过程是一场大型的伦理教化现场。一开始，复仇女神在前两部剧中往往作为“幻影”存在，直到第三部，她们的形象开始实体化。因为展示共同体内的恐惧并将其驯化的第一步必须是“提供邪恶力量的视觉形式，当它们无形有形时，最令人恐惧”（Porada 1）。当复仇女神的形象开始出现在舞台上时，也就意味着她们进入了城邦公共的生活，进而通过戏剧表演，促成古典时期的性别规范的构建和成熟，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绝不是一种稳定的身份或各种行为发生的代理场所。相反，它是一种在时间中牵强地构成的身份——一种通过程式化的重复行为而建立的身份。此外，性别通过身体的风格化而建立，因此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方式。基于此，各种身体姿势、动作和表演构成了持久的性别自我的幻象”（Butler 519）。在巴特勒的视角中不难发现，复仇女神及其体现的女性特质正是在“重复性行为”中建立，这样的“怪物”是根据共同体制定的“何谓好的、可接受的、正常的或自然的”标准而定义，从而导致“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文化，或者同一文化中的不同观点，会出现不同的答案”（Atherton x）。在与男性特质的对比中，怪物呈现了一种有序社会的“颠倒模式”，它们作为由社会规范所定义的他者出现，并成为特定文化的产物。³因此，不论是转变前复仇女神的怪物形象，还是其转变后符合城邦伦理的女性特征，都是在城邦话语的重复性叙述中形成。希腊人之所以要创造与自身对立的典范，这是因为雅典公民的“希腊性”往往通过边缘人（非希腊人、女性和奴隶等“负面人物”）而定义。而积极的词语定义了自由、希腊人（雅典人）和城邦的男性公民。⁴在对复仇女神的恐惧及其驯化的过程中，埃斯库罗斯展现了符合希腊人或者说希腊成年男性的伦理规范。进一步地，“人类通过叙事不仅建构了自我身

1 德国古典学家韦尔纳·耶格尔（Werner W. Jaeger）指出 *paideia* 是古希腊语境中的一个复杂的概念，现代意义上文明、文化、传统、文学或教育等概念。但它们都没有真正地涵盖希腊人所说的 *paideia*。参见 Werner W.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1, translated by Gilbert Highet,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46, v.

2 参见 Mark Griffith, “Brilliant Dynasts,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Oresteia*,” *Classical Antiquity* 1 (1995): 62-63.

3 参见 Liane Posthumus, *Hybrid Monsters in the Classical Worl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Hybrid Monsters in Greek Mythology*, 2011,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PhD dissertation, 24.

4 参见 Page duBois, *Centaur and Amazons: Women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4.

份，而且最终理解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对道德意义的诉求，达到伦理化的目的”（尚必武 29）。复仇女神及其代表的报复性观念呈现的是古希腊人对于传统习俗的理解，阿波罗则象征着理性和法律的新兴观念。通过埃斯库罗斯对二者的叙述，古希腊人既能增加对伦理和法律的多重理解，也能进一步地定义自身的道德立场，从而建立起自身的公民身份。

在这部剧作中，复仇女神作为传统复仇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力量的代表者，展现了她们在兽性因子的操控下的混乱伦理观念。直到剧作的最后一部，复仇女神与阿波罗以论争的方式对话，由此形成了“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伦理”，从而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体良好伦理秩序的建构”（苏晖 董旭 144）。在雅典娜的影响下，复仇女神从纯粹的兽性和非理性的复仇者，转变为一个参与城邦生活的成员，从而形成了新的城邦伦理秩序。自此，女性遵循安静而审慎的伦理，保持谦逊与服从，男性则占据公共生活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边缘化，由此反映了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女性伦理的形成。

Works Cited

- Aeschylus. *Oresteia: Agamemnon, Libation-Bearers, Eumenides*, translated by Alan. H Sommerstein. MA: Harvard, 2008.
- Atherton, Catherine. *Monsters and Monstrosity in Greek and Roman*. Bari: Levante, 1998.
- Bakola, Emmanuela. "Seeing the Invisible: Interior Spaces and Uncanny Erinyes in Aeschylus' *Oresteia*." *Gaze, Vision, and Visuality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edited by Alexandros Kampakoglou and Anna Novokhatko. Berlin: De Gruyter, 2018. 163-186.
- Bremmer, Jan N. "Monsters en Fabeldieren in de Griekse Cultuur." *Mededelingenblad.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Allard Pierson Museum* 68 (1997): 2-5.
- Butler, Judith.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 *Theatre Journal* 4 (1988): 519-531.
- Cohen, J. J. *Monster Theor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6.
- DuBois, Page. *Centaur and Amazons: Women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82.
- Foley, Helene. "Choral Identity in Greek Tragedy." *Classical Philology* 1 (2003): 1-30.
- Felton, Debbie. "Rejecting and Embracing the Monstrou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onsters and the Monstrous*, edited by Asa Simon Mittman and Peter J. Dendle. London: Routledge, 2012. 103-131.
- Gabriel, Katherine Anne. *Performing Femininity: Gender in Ancient Greek Myth*. New York: Bard College, 2016.
- Griffith, Mark. "Brilliant Dynasts,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Oresteia*." *Classical Antiquity* 1 (1995): 62-129.

- Hall, Edith. *Greek Tragedy: Suffering under the Sun*. New York: Oxford UP, 2010.
- Jaeger, Werner W.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1, translated by Gilbert Highet.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46.
- Konstantinou, Ariadne. “The Lioness Imagery in Greek Tragedy.” *The Quaderni Urbinati di Cultura Classica* 2 (2012): 125-144.
- Marciniak, Katarzyna. *Chasing Mythical Beasts: The Reception of Ancient Monsters in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s’ Culture*.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20.
- Manicas, Peter T. “War, Stasis, and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 (1982): 673-688.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外国文学研究》6 (2011): 1-13.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s and the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人类文明三阶段论”, 《东吴学术》5 (2022): 6-13.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Three Sta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Soochow Academic* 5 (2022): 6-13.]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 “论人的认知与意识”, 《浙江社会科学》10 (2020): 91-159.
- [—: “On Human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0 (2020): 91-159.]
- Posthumus, Liane. *Hybrid Monsters in the Classical Worl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Hybrid Monsters in Greek Mythology*. 2011.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PhD dissertation.
- Porada, E. “Introduction.” *Monsters and Demons i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edited by Ann E. Farkas, Prudence Oliver Harper, and Evelyn Byrd Harrison. Mainz am Rhein: Philipp von Zabern, 1987. 1-11.
- Pestell, Ben. “Kindly Terror and Civic Fury: Eumenides and the Language of My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7): 305-328.
- Sewell-Rutter, N. J. *Guilt by Descent Moral Inheritanc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Greek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P, 2007.
- 尚必武: “叙事身份的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学术论坛》6 (2022): 20-30.
- [Shang Biwu. “The Connotations, Significance,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Narrative Identity.” *Academic Forum* 6 (2022): 20-30.]

苏晖：“伦理智慧与伦理选择：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核心范畴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2022）：79-105。

[Su Hui. “Ethical Wisdom and Ethical Choices: Reflections on Core Categories in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22): 79-105.]

苏晖、董旭：“对话伦理与伦理选择”，《外语导刊》4（2024）：141-149。

[Su Hui and Dong Xu. “Dialogue Ethics and Ethical Choices.” *Foreign Languages Bimonthly* 4 (2024): 141-149.]

Treu, Martina. “Dark Ladies, Bad Girls, Demon Queens: Female Power and Seduction from Greek Tragedy to Pop Culture.” *Seduction and Power: Antiquity in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edited by Silke Knippschild and Marta Garcia Morcillo. London: Bloomsbury, 2013. 71-84.

Werner, Cynthia. *The Erinyes in Aeschylus’ Oresteia*. 2012.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PhD dissertation.

Winnington-Ingram, R. P. “Clytemnestra and the Vote of Athena.”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68 (1948): 130-147.

杨革新：“伦理批评的重新界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6）：117-121。

[Yang Gexin. “Redefinition of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2016): 117-121.]

Zeitlin, Froma I. “The Dynamics of Misogyny: Myth and Mythmaking in the *Oresteia*.” *Arethusa* 11 (1978): 149-184.